

宝马车轻捷快速从机场向香港市中心驰去，车窗外五光十色的彩光一闪而过……

我不时地观察着身旁驾车的小伙子。他活脱脱就是当年“西安号”的轮机手——大头虾——十多年来我一直寻找的童年时的大朋友。

“我像我爷爷年轻的时候吗？”他的目光仍专注着前方。

“像，太像了！”我由衷地赞叹。他不仅外貌酷似，而且那种眼观六路的机敏劲儿更像。

“我爷爷还怕我接不到你呢！”他笑了笑，“我说绝不会的！”

的确，我快走至机场出口处时，就看见接客人群的最前面，有人举着一张大白纸，上面写着欢迎我的字样，而落款却画着一只人头虾身的大头虾。这漫画形象设计还是当年我的恶作剧。

当年我十岁，大头虾十八岁。

一九四三年的暑假我最快活的去处，就是停泊在澳门内港码头的“西安号”货轮。小朋友喜欢到那里，不仅因为我们可以比赛谁敢从船头跳水，关键是水手大头虾喜欢跟我们玩，而且他玩的花样特别多，对我们也很友善。

船长嘛？我早就看到过他，身材不算高大，但穿着一身海员服，英俊潇洒。有时他也会只穿一条游泳裤，从船头跃入水中游泳。他那发达的肌肉，飞燕式的跳水姿态，让我们赞羡不已。我们景仰他更重要的缘由，是听大人说“西安号”是在香港注册的，属于香港一家运输公司，去年“西安号”运货归来，听说日军占领了香港，船长不愿为日本鬼子服务，便驾船到澳门来了，一直滞留在内港码头。

海边长大的孩子，十个有九个梦想要当船长。当船长就在身边的时候，敬畏之心又拉开了彼此之间的距离，不敢去接近他。没想到，机会却突然降临了，终于让我跟船长熟悉起来。

一天上午，我刚游完泳，从软梯登上了甲板，大头虾就非要跟我比一比。

船长笑眯眯地说：“你和大头虾比比谁能说出更多水泊梁山好汉的姓名，而且要带绰号的。”接着又说，“谁赢了，我请客。”

结果我赢了，大头虾说了二十四个，而我说了四十二个。

船长高兴地一拍掌：“走！”带着我们五六个小孩，还有大头虾，到了码头对面的日本料理店。

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到了日式的寿司和生鱼片，也认识了料理店的老板谷板先生。

船长三十二岁，谷板先生三十六岁。他们和我这个十岁的小孩怎么会交往起来，而且自此几乎每天会在一起盘桓几个小时呢？回想起来也是有点原因的。三个人都喜欢看明清小说，尤其是《三国演义》。这部书的人物、故事是我们每天的话题。另外我们都喜欢象棋，

他俩对奕时，我是船长的参谋，实际上是两对一。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，谁不痛恨日本人呢？我当然不例外。开始我是很讨厌谷板的，但接触多了，思想情感也有些变化。他热情、彬彬有礼，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。

这样的生活一直延伸到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九日晚，日军化装成渔民，闯入世界公认的中立区，劫走了“西安号”。

二十日晨，我闻讯赶到内港码头，昔日“西安号”的泊位已是空空荡荡，我再去看对面的日本料理店，居然也是空空的。谷板也消失得无影无踪……

“到家了！”大头虾的孙子驾车缓缓向一栋三层楼走去。

我看见楼前门灯映照下，站着一位老人向我们招手。他结实、粗壮，硕大的脑袋上全是白发。绝对错不了，他就是大头虾！

“你别急，我请你来就是要给你说说‘西安号’的事！”我并没有开口，他抢先说了一句，然后对他孙子说，“阿添，没你的事，去睡吧！”

“让我听听嘛！”阿添回了一句，目光却转向我，“可以吗？”

我连忙替他说明，他爷爷终于同意了，但有一个条件，只准旁听，不许插嘴说话，然后把让我到他卧室沙发上落座。

卧室的陈设很简单，一张带床头柜的床、沙发、小圆桌、靠墙一排大柜子，墙角旁有一台冰箱。非常整洁，没有任何装饰品。

就在我观察房间的时候，阿添却小声给我说个不停，我才知道他的父母早就移居澳大利亚，只有他和爷爷留在香港。原因是爷爷死活不肯出国。阿添也是海员，是个见习的轮机手。

从我进房开始，大头虾就忙个不停，小圆桌出现了几个冷盘：烧鹅、油炸花生米、卤牛肉、凉拌黄瓜。

“来，上桌！”大头虾边招呼我，边对阿添说，“不准告诉你爸爸妈妈。”说着他像变戏法似的，将一瓶人头马和一碗小冰块放到桌上。

阿添边从小圆桌下抽出坐凳边对我说：“爸爸妈妈叮嘱我，要照顾好爷爷，要监督爷爷，不让他喝酒！”

“六十岁了……”大头虾激动地说不下去，而且眼里闪着泪光。

“邓先生——”三天前阿添给我电话，我才知道他姓邓，但我一开口就被他打断了。

“你别叫我邓先生，我也不称呼你周先生。你还是叫我虾哥，我也叫你黑猫好吗？”真是出乎我的意料，六十多年来，没有任何人叫过我小时候的绰号，这样一来三人马上就融洽起来，距离完全消失了。

这位老虾哥喝着酒开始讲述“西安号”被劫后的经历。我随着他的话语而心潮起伏，只是听，几乎没有主动插话，

爬上来冒着寒风脱个溜光，赶紧穿上干的棉衣棉裤回营地，回去的第一个任务是抢位置，用汽油桶弄个炉子烤，不烤干的话第二天就只好湿着穿。东北的冬天已经寒风刺骨，野外干活都要喝酒。到那里才知道自己能喝酒，并且能喝那么多酒。”

六十度的“北大荒”，大半瓶下肚后照样干活，从此他有了个“海量”的美名。

“白天干活，晚上还要轮着站岗。站岗的人当晚发一支枪，两颗子弹。守着一大堆火，你就是你的周围。它们是围着食堂的肉味儿来的，绝对不能掉以轻心。夜深人静，仿佛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睡着了，只有我一个人保卫他们，就有一种自豪感，觉得这就是保卫祖国，在做最革命的事。心里还常滚动着一些诗句，什么‘枪刺挑落了晨星，战士迎来了黎明’，什么‘淋一身雨水，就让我们用青春烈火烘干衣裳’。

好家伙，觉得全世界都在我一人肩上扛着呢。”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出版，濮存昕 童道明著《我知道光明在哪里》）

艰苦的知青生活，也有许多值得濮存昕回味的经历，放马就是其中之一。连长看他工作认真负责，就安排他去放种马。别人扛着锄头下地干活，他去放种马，可他却却是吹着口琴去放马。马撒开

唯恐打断他的思绪。我没有做笔记，因为一开始我就打开了录音机。

那天晚上，我从睡梦中惊醒，匣子枪口正对着我的头，随即被押上了前甲板。黑蒙蒙中我看见十多个人双手抱着头顶，蹲成一排，四周有几个穿便衣手握匣子枪的人看守着。我也被如法炮制，双手抱着头顶，蹲在最边上。我不时偷窥着，却没有发现船长的身影。

“西安号”离开了码头，静悄悄地向前驰去。这时澳门市内响起了机枪声，弹道光火一连串闪过夜空，这是日军为掩护劫船而制造的把戏。

“西安号”跑到公海时，我发现日军的巡洋舰在接应，并有一艘电机（汽艇）飞速跑来，贴靠着“西安号”。货轮上的日军便衣立即要蹲着的人犯站起，驱赶他们下到电机上去。其时，我在忐忑不安中看到，人质是几天前船长收留从香港逃出来的那一家人。

“我系船长的太太，你唔可以带走

寻找“西安号”

周毅如

我！”突然人群中有个女声叫了起来。

虾哥讲到这时，故弄玄虚地眯着眼睛问我：“你知道她是谁吗？”停了自己回答说，“你叫她丽姐的，你还记得吗？”

丽姐，我当然记得。她是个混血少女，十九岁，每天都会到“西安号”附近游泳。一天，我们发现她和船长一块儿去看晚场电影，还偷偷议论：船长和丽姐“扭扭”了。

虾哥将剩下的半杯酒一饮而尽。阿添在他催促下又给他斟满了一杯。他又继续说了起来……

丽姐叫嚷着与日军便衣拉扯时，一个身穿海军服的日本军官走来，用日语向便衣说了几句，然后带着丽姐走到我身前，却用广东白话对我说：“你也跟我走！”

我大吃一惊，发现这日本海军军官竟然是日本料理店的老板谷板！

丽姐与谷板的出现，大大震撼了我的心灵！老虾哥也感慨万分地说，他根本没想到谷板会是日本军官！我的好奇心及作为编剧的本能催使他继续说下去，他却说饿了。我看看手表已是深夜两点多钟了，我确实也饿了。阿添火速叫来了外卖，三大碗沙河粉，片刻就给我们吃光了。

吃完后，老虾哥问我：累不累？要不要睡觉休息一下？我看他神采奕奕的样子，也反问他要不要休息，一切由他决定。他笑着说他憋在心里几十年了，巴不得一吐为快。他又继续开讲了，不过显然简略了不少……

在草地上吃草，喂饱了，他中午还能抽空回来睡一小觉。

在种马班濮存昕的生活很自在，经常跟师傅上山去打猎，下河去摸鱼，回到师傅家，就改善一下伙食，跟师傅喝上二两“北大荒”。在种马班还发生过一次险情，濮存昕在山上割草，马笼头脱了，马就顺着坡跑下了山。山下放的是一群怀孕的母马，要冲撞起来麻烦可就大了。要是流产了，就算事故。眼看着种马冲上去，母马一下炸了群，放母马的兄弟赶紧将母马往圈里赶。他想给种马套上笼头，可马不老实。这时候种马班班长老张口，从马屁股后摸上去，趁种马只顾喂母马，一步蹬上，用胳膊把马脖子抱住，张嘴就咬住

马耳朵，马上立刻老实了。

濮存昕在北大荒经受暑天“蛭蟻、大蚊、泥粘脚”的训练，冬天的“风鞭、雪刀、冰世界”的考验。濮存昕生得高大，同行的知青只要喊一声“濮哥”，他就把费力的活儿自己揽过来，铲大豆、抡小麦、刨冻土、锯大树，使他真正感受到“劳动创造人生”的价值。

濮存昕意识到自己不能荒废青春时光，他常常有意识地磨练自己的耐性，找来一大堆弯曲的锈钉子，坐在树阴下一干就是大半天，愣是把一大堆的弯铁钉一颗颗地敲直了。他被调入团宣传队后，经常和同伴们深入田间地头，为职工和知青们表演样板戏、对口词、快板诗，很受大家的欢迎。业余时间，是篮球给了他无限的乐趣，摆脱了多少苦闷与烦恼。他深有体会地说：体育锻炼不仅可以强身健体，还能愉悦身心，如果你遇到不顺心的事，最好的解脱办法就是运动，血液在畅快地循环，心脏在欢快地跳动，一切烦恼都挥之而去，烟消云散。

一九七〇年，濮存昕被调到团业余宣传队，在演的京剧《沙家浜》中饰演了第一个戏剧角色——县委书记程潜明，

“西安号”并没有滞留，继续向广州方向驰去。

船上只留下了船长、丽莎、谷板和我，另外有两名担当机房柴油机手的日本人。

“西安号”停泊在广州期间，被改装了。甲板上漆上了很大的红十字，烟囱上“西安号”字样也换成了“大红红”。对我们的着装也有要求，船长和我必须穿海员服，丽莎是洁白的护士打扮，谷板有时在军官服上罩上白大褂，俨然是个军医。

“大红红”伪装成救护船，实际是替日军运送军用物资的运输船，穿行在广州、海南岛、香港之间。“西安号”从此消失了。

谷板有一天在驾驶室里很坦诚地对船长和我说了，自己的真名是佐佐木，是日本海军军官，在澳门的任务之一，就是要劫持“西安号”。特别强调船长和我不是军人，海员无国界，是被日军征用的，只管好本职的事就可以了。



澳门港口

从一九四三年八月到一九四五年初，我们在三座城市穿梭航行，十分紧张，就是停泊码头装卸“货物”期间，我们还要继续航行的准备。

佐佐木表面上似乎很友善，但对我们监视很严，尤其是停泊时，几乎与我们寸步不离。不过船开了以后，他就很宽松了。

一年多的时间里，我们这条船经历过盟军飞机的多次追踪、扫射，甚至轰炸，多次险遭撞击水雷……可以说这条船有惊无险的原因：一是船长的沉着机敏、技术高超；另一方面甲板上的红十字无疑也起了作用。

哦，我差点忘了说，船长和丽姐还在船上举行了婚礼。那是第一次从广州开到海南后，佐佐木一手张罗的。船长卧室布置成了新房，点了两支很大的红烛，贴了红纸剪的大双喜字。佐佐木还亲自

全剧就四句唱，最后一句“草药一剂保平安”，他唱不上去，只好请人幕后帮腔。当时连姑都是自己化的，那年他才十七岁。

后来，濮存昕当上了宣传队的副队长，开始负一定的责任了。有一年，他被团政治处从连队叫到了团里，团里领导说：团里没煤了，必须在一个星期内组织一台文艺节目，到鹤岗煤矿慰问演出。用现在的话讲，就是拉关系买煤。他说：“一个星期哪能排得出节目，再说，大家都散在各连里干活呢！”领导说：“不行，这是任务。你要是不干，就下连队去。”濮存昕心里很生气，但是他当时没有顶嘴，只用沉默抗议，心里恨得官僚了。领导后来也妥协了，他们说：“排不出新节目，老的那也行。”一辆大卡车把宣传

队的人都接回来，大家凑在一起商议，只有六天时间，到底能演什么。结果是，排几个新节目，弄几段老相声，最好再来个小话剧撑时间。正好有人看到《解放军文艺》上有个现成的剧本叫《苹果树下》，说的是辽沈战役打锦州，解放军渴死也不吃老百姓苹果的故事。时间紧，大家分头做。濮存昕是导演兼主演，并负责舞美设计和制作。拉木方和豆包做布景。搭老乡家的小破房子，门口苹果树的苹果是他用纸浆做成的，树叶则是用缝好的豆包布画上树叶剪下来贴到网子上，再把很轻的上好色的纸浆苹果挂上去。整夜整夜地画布景，忙得连台词都顾不上。领导审查节目，音乐都奏起来了，他那边词还没跟上，台上台下笑成一片。那位领导拂袖而去，但求煤心切，就这样让他们去演了。

濮存昕在北大荒干了八年后，完全成了“北大荒人”。后来，知青政策有点松动，一批批知青回城了，濮存昕离开北大荒时还有点恋恋不舍。

刚从北大荒回家，濮存昕洗去一脸风尘，换了件合身的衣服，遗憾的却是无事可干。那天晚上，人艺恢复排练，濮存昕站在舞台后默默地看人家排队。

下厨房，做了一桌当时可以说是很丰盛的喜宴。

一九四四年的七月，丽姐生了个女儿，船长给她取了个名字叫和平。佐佐木知道了，当着我们面说名字取得好，还挺动感情说希望小平平能给大家带来好运，战争早日结束；还说战后他不当军人了，要去开料理店。

那时候我们心里都明白，希特勒完蛋了，日军也长不了啦！

“唉——”老虾哥长叹了一口气，抄起酒杯，发现是空的，自己拿过酒瓶给斟满了，又给我也加满了，“唉，胜利早半年就好了！”

我马上预感到不幸的事要发生了，脱口而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不想发生的事，还是发生了！”老虾哥猛地抄起酒杯，一口气喝了下去。他放下酒杯，我看见他眼睛里全是泪水……

一九四五年四月的一天，船刚停泊在海南岛的码头上，我就发现这次装船与往日大不相同：一个个大木箱往船上运，不仅码头上下戒备森严，而且连搬运工全是日本军人。佐佐木也接到命令，要这船做好随时都可以出发的准备。偏偏这个时候，柴油机出毛病了，最后查出来是气缸垫破损。于是佐佐木要船长和他一块离船去找柴油机零件，我和两个柴油机手继续清洗机器。等我完成任务从机器房上到甲板，一身油污，准备回卧室换衣服时，听到丽姐拼命的喝骂声：

“你这畜牲！”

我心知不好了，连忙往船长卧室奔去，接着又传来“啊”的一声叫吼，显然是男人的声音。

船长的卧室的门是半开着的，我冲了进去，被眼前惨绝人寰的场景惊呆了。

丽姐和小平平都躺在血泊里，丽姐上身衣服显然被撕破，离她们只有一步远的地方，倒着一个赤裸上身，背朝天的日军，背上嵌着使他丧命的水手斧，军服上衣扔在一边。

我转过身来，往外走，却遭到受到一名日军迎头一击，就晕了过去。等我醒过来，才发现自己半卧半坐在驾驶室一角的圈椅上。我没有吭气，因为我看见佐佐木正跟手握舵轮的船长说着话。

船在黑夜里航行着……

“……我什么都如实地给你说了，战争的时间太长了，形势对我军越来越不利，人心涣散，军纪松懈，才会发生这样的事。我没法安慰你，只是请你理解，战争时期什么事都可能发生！”佐佐木说完了，船长没有回应，只是目视前方。

过了片刻，佐佐木匆匆走了。

我急不可待地走到船长身边，我还没开口，船长沉重地对我说：“我都清楚了，你什么都不要说了！”

船，继续向香港进发，一路上船长几乎一言不发。我预感到这就像火山爆发前的沉寂，但火山一定会爆发的！

一九七八年，中国大地历经“十年浩劫”的磨难后，呈现万物复苏的新气象。二十五岁的濮存昕，迎来他最美好的时代，实现了他儿时当演员的梦想，心中的激动无法言状。

一九八六年，中国话剧界之鼎，京都最具实力的北京人艺，拟排话剧版《秦皇皇太子》，缺一个重要演员扶苏。于是，人们想起了空政的濮存昕，就借他来演出。这一演，果然博得好评。

这以后，濮存昕在《雷雨》中演周萍，《天下第一楼》中演大掌柜，《哈姆莱特》中演哈姆莱特，《李白》中演李白，还上演了《天之骄子》、《阮玲玉》、《古玩》等剧，结果很多人物都演得颇具神采，濮存昕很快成为人艺的台柱子。

濮存昕现在影视作品不断推出，片约不断，可以说视为他打出了知名度，使他有了大批的影迷。在他成长的道路上，首先是谢晋导演慧眼赏识他。那年，谢晋热衷于拍三国片，他悉心筹拍一部名为《赤壁之战》的影片，

在北京选择演员时，特地到人艺会晤濮存昕。谢导请他加盟《赤壁之战》，濮存昕早知谢晋的声望，很赞赏谢晋的人品艺德，一口答应。不料该片因故未拍成，谢晋也没忘记这位宁静、淡泊、谦逊、诚恳的小生演员。一九九〇年谢导演执导《最后的贵族》时，一下子想起了濮存昕，非请他出演陈寅一角，因剧中的陈寅是哈佛大学的才子，让濮存昕演有其难得的书卷气。

后来，濮存昕又与日本著名演员栗原小卷联手，演出了《清涼寺的钟声》。在电影《杨贵妃》中饰演王涓。还在话剧《巴黎人》、《鸟人》、《云南故事》、《蓝风筝》、《与往事干杯》中担任主角。并在《正午阳光》、《中国姑娘》、《编辑部的故事》等多部电视剧中客串角色。一九九一年他荣获第二届中国话剧金狮奖，成为一颗影视剧三栖新星。

濮存昕说，要成为演员，而不是成为明星。成为明星容易，成为演员难。明星，可能在耀眼的天空划过而过，没有留下什么痕迹，而演员是要当做一门学问来做的。在近二十年的舞台生涯中，他演出了二十多部戏，并且都是担任主要角色，成为北京人艺新一代挑大梁的

船，沿航道继续前进，一切似乎都很正常。直到离香港还有不到十海里时，船长趁佐佐木去厕所的时机，悄悄对我说，他去买零件时，看见报纸上刊登了日军吹嘘说要以香港做桥头堡，与盟军决一死战。他还说现在船上装得满满的—一仓货，肯定是日军的重要武器装备，而最后上船的将近四十名日军，都是中高级军官。他狠狠地说，绝不能放过这些日本鬼子！继而叮嘱我，必须做好准备，在船离香港不远的地方，他会降低船速，要我趁夜偷偷偷下水，只要游一百多米，就可以上虎头滩。我说不愿意离开他，要和他共生死。他眼睛一瞪，却说了一句：“你来掌舵，我要休息一下。”我一愣，发现佐佐木正走进驾驶室。

我只好去握住舵轮，船也在继续前进。过了片刻，船长从圈椅里站起，走近我身后的佐佐木说：“你看，这前面是什么？”佐佐木循其所指，从驾驶室的玻璃窗向前面观看。一刹那，船长挥起一把大活动扳手，向佐佐木头部击去，一下就把他打昏过去了。船长压低声音吩咐我，要我稳住舵轮。他俯身就将佐佐木扛上了肩，迅速离开了驾驶室。大概也就一两分钟，他就回来了，马上接过舵轮，用我从来没听过的极严厉的的口吻低声说：“你出去，等我船速一减，你就行动！”说完从旁边的柜子里取出一件救生衣，抛给了我，并斩钉截铁地说：“这是命令！”我知道说什么都没用了，便穿上救生衣，最后看了他一眼，他握着舵轮，头也没回，只说了一个字：“快！”

我出了驾驶室，刚到船舷边，船就减速了。我一跃而下，奋力向滩头游去，很快就上了岸，等我一直起身子，就听到船上高音汽笛拉响了，看见船头三盏强光照灯也全亮了，显然船在高速前进。我知道，过了这虎头滩，航道两边全是盟军飞机布下的水雷，马上明白了船长要干什么！

巨大的爆炸声中，船成了一个大火球。我放声哭喊着船长的名字。半个多小时后，一切都消失了，黑黑的夜空，显得格外宁静。我这才发现救生衣口袋里，有硬硬的东西，掏出来一看，油纸包里竟然是船长和丽姐抱着小平平的照片，还有两根沉甸甸的金条。

老虾哥讲完了，我们都默默地坐在那里。我心里像灌了铅，沉重得透不过气来。阿添缓缓地走到窗前，拉开了窗帘。我们才知道一夜过去了，天已经亮了。我回到小船上，每提起桩心，心里就激动得很，不知道该如何下笔……直到前不久看到报纸上则新闻，说日本人又在钓鱼岛附近阻挠我国渔政船执行公务，妄图永久霸占自古至今都是我国领土的岛崎。我心里突然明白了，不要再顾虑用什么形式，写成什么作品。我只要把录音整理一下，如实地将“西安号”的事写出来，公诸于世，也就够了。

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！

优秀演员。

濮存昕为什么扎根舞台，舞台为何使他独痴情于这块方寸之地，他说这与他从小就在人艺的院子里玩，看叔叔阿姨们排戏演出不无关系。他的父亲苏民是北京人艺的著名导演，戏剧教育家，并且写得一手好书法，曾演过《蔡文姬》、《王昭君》、《雷雨》等剧目，导演过濮存昕主演的《李白》、《天之骄子》，在《鸦片战争》中，他饰演了道光皇帝，这对濮存昕的艺术熏陶有着重要影响。苏民原姓濮，名思洵，字苏民，可能与宋代的苏洵有点关系，祖上喜欢苏洵的人和文章，所以就起了这么个字。解放前做地下工作，一直用的是苏民，后来，叫习惯了也就一直没改过来。

一九九五年，濮存昕接拍了三十九集电视连续剧《英雄无悔》，饰演公安局长高天，他塑造的这个非一般意义上的公安战线上的新一代公安领导形象，经过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放，产生了较大影响。当初，《英雄无悔》剧组所有编、导、制片等人在北京寻觅选择饰演高天的演员时，不约而同地写出了濮存昕的名字。这样一致的巧合感动了濮存昕，他接受了高天的角色。

在万众观看《英雄无悔》的日子里，濮存昕面对一片赞扬声，笑着说：“现在拍现实生活的戏，一定要拍到老百姓所关心的生活脉络上。远离生活，观众不接受，必须要反映大家关注的生活网络，才能引起观众的兴趣……”

濮存昕的戏路很宽，由他主演的电视连续剧《运河人家》，在北京电视台每晚一集与观众见面了，没有炒作，第一次扮演农民的濮存昕再一次被认可，观众说他“朴实、自然，感觉真的不错”。可有谁知道，就是在拍《运河人家》的那个冬天，数九寒天，濮存昕穿着单衣在寒风中光着脚丫卖西瓜，拍了个把小时，他竟没生病，这与他常年坚持锻炼是分不开的。

八年的北大荒生活，对濮存昕来说是挥之不去的一种情结，对他的艺术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他说：“北大荒长时间的生涯，是磨难，也是锻炼，大悲大喜能增加对人生的理解能力和承受能力。这对一个男演员尤其重要。男人的形象中应该有立得稳、提得起的气质，还要有克服困难的决心和面对困难的承受能力。”



濮存昕(右一)到北大荒后与同学合影